

晚清以来，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，造成了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（李鸿章语）。欧风美雨的强劲到来，使国人的精神家园处于风雨飘摇当中。许多思想家陷入纷争、迷茫、焦虑、困顿，不知何去何从，引发文化认同危机。伴随着国运沉浮、民族兴衰，在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上，不时出现“自卑自谴”和“自大自闭”两种倾向，对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。面对这一状况，是否能够实现文化自省与自救，是衡量文化自觉与自信程度的重要标尺。

□ 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

匹夫之责：文化自省与自救

代玉启

① 反省文化自卑、自谴心态

法国汉学家拉库伯1894年出版《中国古文化西源说》，影响颇大，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对此深信不疑，并运用自己熟悉的文字音韵学和古史知识，从古迹、古籍中寻求佐证以附和之。在当时的语境中，“文化落后→制度落后→国力贫弱”成为部分思想家探究中国落后的基本逻辑。以至于胡适说：“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，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，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，并且道德不如人，知识不如人，文学不如人，音乐不如人，艺

术不如人，身体不如人。”这是“西方中心论”“全盘西化论”的典型表现。

学者潘光旦在国外研修优生学，曾致信好友闻一多谈及中国人的生育意识。闻一多用激烈的言辞复信明确指出：“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论，来证明我们中国人种上的劣，我将想办法买手枪。你再一回，我亲手打死你。”

正如无法抓着头发将自己从大地上提起来一样，我们也无法脱离身处其中的文化背景。我们踏着历史的河流而

② 反省文化自大、自闭倾向

关于近代文化发展的态势与走向，另一个极端即文化自负，由“西方中心论”跳到“东方中心论”。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，古人逐渐形成的讲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尚和合、求大同思想，散发出历久弥新的精神魅力。但与此同时，我国自古以来极重华夷之别，而二者区别之根本不在其他而在文化，故有“华夷之别，在于文野”之说，由此形成历史上始终以华夏文化为最高文明范式的文化观，形成一种正统、自大、自闭的文化精神。

这种观念在明清之际发展至极，表现出对外来文化贬抑拒斥的虚骄自大心理，对域外文化、科技等多以“外夷异说”“巧技淫艺”定位，痛斥深拒之。即使作为代表当

来，传统文化在每个人身上打着深深的烙印。数典忘祖、蔑视传统、一味丑化民族文化的做法，有百害而无一利，造成普遍的文化焦虑和文化自卑。对于本民族文化无知、隔阂、冷漠的人，无法担负起接续文化传统、光大民族精神的职责。如果不审慎体察近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、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西方近代文化的精神实质，不戒除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，盲目照搬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、文化样式，不切实际地提倡西方的民主、自由等观念，鼓吹所谓“天下人人归于一”的“社会平等”，对国家和社会可能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。鲁迅曾多次提醒大众，要警惕“人丧其我”“举世惟知识之崇，人生必大归于枯寂”的局面。

时先进思想潮流的洋务运动主导者和参与者，为抵御顽固守旧派的攻击和责难，提出的口号也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。当时有人批判试图翻译西学的学者“不思古帝王大经大法所在，而不知彼之妖妄怪诞，所当深恶痛绝者，正在此也。”“惟天地开辟以来，而中国之教自伏羲以迄周孔，传心有要，阐道有宗，天人之际，发泄尽矣，无容以异说参之。”这些论调明显表现出华夏文化正统、自足的偏狭之见。

全面而理性地认识“西学中源”“中体西用”论，摒弃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，是反思文化定位、寻求文化自救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闭锁向度的流弊，探寻文化自觉与自强之道。例如，时贤梁启超着眼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，疾呼改造国民性，力图塑造中国少年和少年中国，提出系统的新民思想，以“新民德”“开民智”“鼓民力”为己任，通过办报纸、撰文章、开讲座，致力于以人的近代化为主旨的思想启蒙工作。
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，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华文化的返本开新和浴火重生。毛泽东指出，“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，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。从这时起，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，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。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，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。”

（作者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）
（本文配件均来自网络）

了制陶所必须的化学成分及矿物质。长兴紫砂挑选泥料、制作工艺和使用十分讲究。开采出的泥料需经露天摊晒松散，将其粉碎筛选出泥灰，再搅拌、处理后形成制坯用的熟泥。除所用水质要求极高外，工艺流传也格外繁复与严密，打泥片、打泥条、打上身筒、打上身筒封口、开口、理身筒、弯盘、围身筒、装盘、装嘴、做盖、成型打印等，环环相扣，一丝不苟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宜兴的谈寅媛和制壶名家蒋蓉的两个弟弟蒋淦春、蒋淦勤以及邵大亨的后代邵全章，先后移居长兴，为长兴紫砂带来重要的影响。凭借着历史机缘以及悠久工艺传统，长兴紫砂实现了由日用器物向优雅艺术的华丽转身。其中，蒋氏家族以坯为纸，描绘眼中的大千世界；吴氏兄弟吴宝根、吴宝华勇于探索紫砂材质与形制的极限；而邵全章之媳王平一的高徒叶亚琴，则创造性地将科学与艺术融为一体，制作出象征长兴地质的“金钉子壶”。有这样一批又一批精益求精的紫砂艺人的不懈努力，长兴和宜兴联袂为茶艺奉献出美妙体验。

□ 历史名人的家训

乔家大院家训—— 损人欲以复天理 蓄道德而能文章

郑清坡



如果去山西旅行，晋商大院是必定要去的，祁县乔家大院即是代表之一。进到乔家大院，人们便会看到一个“百寿图”照壁，照壁两侧镌刻有“损人欲以复天理，蓄道德而能文章”的楹联，意为引导人的欲望以达公理，积蓄道德而有礼法。此联原为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拜访乔致庸时题赠，既是对乔家家风的赞誉，也道出了乔家家训的内涵与精髓。

乔致庸（1818年—1907年），乔家第一代当家人乔贵发的孙子，正是在他的努力经营下，乔家生意日渐兴隆，达至鼎盛，曾有“先有复盛公（乔家商号），后有包头城”的说法，所属商号、票号遍布各地。能有此成就自然离不开乔家“损人欲以复天理，蓄道德而能文章”的家训家风。

乔致庸治家甚严，他除《朱子治家格言》为准则规范子孙日常行为，还在祖训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家规，拟定六不准：不准纳妾、不准虐仆、不准嫖妓、不准吸毒、不准赌博、不准酗酒。身为商人家族，他经常告诫子孙：经商首重信，次重义，最后才是利，且须戒骄、戒贪、戒懒。乔致庸晚年对子孙乔映霞维护家族繁荣寄予厚望，常教诲他唯无私才可成大公，唯大公才可成大道，对其立身行事产生了很深影响。乔映霞成为乔家掌门人后，更是严格恪守家规家训，治家以严，经商以信。

乔致庸树立的家训家规，乔家子孙基本都能够严格遵守；而其最主要的影响还是体现在他们于商业经营活动中坚持以信为本、以义取信。清末某年山西粮油欠收致油价上涨，乔家复盛油坊从包头调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，然经手伙计暗中往油里掺假、以次充好牟取暴利。此事被掌柜发觉，立即追回假油，重新灌装好油销售，并开除涉事伙计。虽然此次油市贸易中乔家蒙受损失，却赢得客户信赖与赞誉。商品交易中常有不法商贩欺斤短两，坑蒙客户，然乔家商号所售商品不仅未有短缺，有时实际重量还会多一些。在包头，乔家复字商号卖一斤面粉实则一斤一两，一下吸引住客户，进而控制了包头的面粉市场，同时也留下乔家复字号“大斗卖出”的美誉。

乔家对建立有相互业务往来商号的“相与”十分慎重，一旦确立则善始善终，示以宽厚仁义。20世纪20年代初，乔家在包头的某“相与”生意亏损，其东家欠乔家复字号数万两白银无力偿还。而乔家当家人乔映霞却将欠款一笔勾销，他认为，与其花钱打官司逼债，不如花钱买个厚道，加深交情。实际上，这些欠债者为维护自家商号声誉，一旦境况有所好转，便会陆续偿还欠款。而乔家的信义之举也赢得了更多客户，各商家都愿意与之往来生意。

1930年中原大战，山西军阀阎锡山败北，致使山西自己发行的“晋钞”大幅贬值，几成废纸。此种境况下，乔家大德通票并未想着发战争财，而是把历年公积金拿出来按照新的币值兑换给要取款的储户，由此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。对此，乔映霞曾讲到，即使大德通因此倒闭也不至于让自己人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，但对储户来说则会威胁到他们的身家性命；孰轻孰重，不言自明。

有人估计，至清末，乔家在全国各地的票号、钱庄、当铺、粮店等有200多处，流动资金多至700万—1000万两，加之不动产，资产可达数千两两白银。自光绪以后，清朝诸多朝廷要员、封疆大吏，山西本省各级官员多与乔家有交往。足见乔家富甲一方，影响深远。而其家族事业能延续200余年，除历代掌门人苦心经营外，则与其家规正人、家风兴业的良好家训家风密不可分。

（作者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）



老外学京剧

③ 倡导文化自觉、自强之道

一个国家的发展应当且必然是多方面、立体式的，不光要有经济实力的增长、政治制度的完善，还要挺起文化的“精神脊梁”。文化自觉，指民族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，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，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。文化自觉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，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。文化自强是立足自己的实际，依靠自己的力量，突出自己的特色，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，使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、影响力、创造力、竞争力，与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社会建设协同推

进，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。

无论是文化自卑还是文化自大，都是文化不成熟、不自觉、不自强的表现，都无益于文化的良性建构和健康发展。克骄矜矜、格局远望、守正创新，彰显文化主体性，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或完全坚守传统文化，到既理性回归传统又广泛开放传统的转变，从完全排斥西方文化或完全倒向西方文化，到甄别与引进以及平衡与整合的转变，才能实现文化自强，走向文化自觉、文化自强。

当时的诸多志士仁人，不管处江湖之远，或居庙堂之高，都试图反思文化自卑、文化自谴、文化自大、文化自

增添了无穷韵味。

长兴紫砂矿产地与宜兴一脉相连，东起黄龙山，西至五通山，以光耀、合溪、白岙矿为最，最大质优。这些地方出产的紫砂泥，因其色紫而不燥、红而不嫣、绿而不嫩、黄而不娇、灰而不暗、黑而不墨被奉为极品。据载历史上宜兴紫砂原料许多也是来自长兴。长兴水口乡顾渚村有两宝：其一是当地出产的色泽带紫、其形如笋的紫笋茶，《品茗》说“金沙水泡紫笋茶得全功”。沉睡于山体的冰冷紫砂矿泥，经过茶香的熏陶洗礼，在长兴紫砂艺人手里“脱胎换骨”，并成就了其与众不同的闲雅、端庄、自然、质朴、内敛、温和、敦厚的个性，紫砂壶因而被列为“世间茶具之首”。好茶配好水，再加上好器物，紫笋茶、金沙泉、紫砂壶，成为今日长兴“品茗三绝”。

通常的说法，紫砂壶的始作俑者是明人供春。民间有一传说：供春在金沙寺做同读书童时，偶遇老僧制壶，忽然间来了灵感。于是，私下里挖缸中沉泥来仿，以寺旁古银杏树瘤为参照元素，捏制成带花纹的泥壶，即为供春壶。无独有偶，长兴水口乡迄今还保存着金山、金山村的地名，金山西南侧古寺院也有旧址遗存。

紫泥是长兴制作紫砂器物得天独厚的原料，天然具备

□ 中国民间工艺

长兴紫砂：紫玉金沙妙手得

王锦强 覃奕

紫砂壶是中国特有的集诗词、绘画、雕刻、手工制造于一体的陶土工艺品，紫砂壶是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完美结合体，再加上紫砂壶泡茶中的妙处以及茶禅一味文化底蕴，综合赋予了紫砂高贵的品质。

紫砂艺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，分别在太湖西岸的泾溪与苕溪流域，滋养出了宜兴紫砂与长兴紫砂这两朵奇葩。其中，长兴因悠久的紫砂陶器制作历史、丰富的紫砂矿资源、深厚的茶文化积淀与精湛的紫砂工艺而与宜兴这朵“姐妹花”并蒂同芳。

长兴地处杭嘉湖平原西北部，长江三角洲腹地，苏浙皖三省交界。东临太湖，西倚天目，山水清静，四季宜人。追溯长兴制陶的历史，可从和平狮子山、林城江家山、雒城台基山等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夹砂腰釜、红衣陶豆、夹砂陶鼎、黑灰陶杯、泥质陶罐等陶器中窥端倪。林城龙山遗址时间跨越晚商至战国，在环太湖地区最早发现了这里烧制的西周印纹硬陶器。林城方山窑址时“千户烟灶万户丁”，唐宋窑业几乎遍布长兴每一座山岗，小浦光耀一带更是龙窑密布。至北宋时期长兴即与宜兴齐名，人称“南窑北陶”。宋以后，宜兴既在日用陶瓷产品上发力，又在紫砂工艺方面攻坚克难，进而打捞出具有相当规模影响力的紫砂业；长兴紫砂一直在缸窑等日用陶瓷的打磨中用劲，工匠们的紫砂情缘为长兴人柴米油盐的生活



金钉子壶 叶亚琴制